

维语方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陈宗振

(中国社科院 民研所, 北京 100081)

摘要: 本文主要内容: 1) 方言研究的重要性; 2) 百多年来国内外的维语方言研究; 3) 在维语方言研究方面值得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 维吾尔; 维吾尔语; 方言; 方言学

中图分类号: H2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823(2000)04-0015-08

一、方言研究之重要性

方言是一种民族语言在不同地区的变体, 研究方言的学问称为方言学或方言地理学。近数十年来, 许多语言学家认为, 一种语言的社会性变体, 即不同社会阶层的语言差异也属方言。因此, 以研究民族语言内部的差异为其任务的方言学如今包括两个分支: 一是方言地理学; 二是社会方言学, 即狭义的社会语言学。前者研究语言的地区性差异, 后者研究语言的社会性差异。方言地理学现在也称语言地理学、地理语言学或区域语言学。①本文所说的维语方言研究是指不同地区维语方言的研究。

方言是历史地形成的, 既跟空间有关, 也跟时间有关。原来说一种语言的人民, 由于居住区域的扩展, 不同地区之间交通不便, 人们很少来往, 语言演变就不会一致, 久而久之就形成不同的方言。②但是, 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 为了适应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 就会形成以某一方言为基础的标准语。此时其他方言区人民大众日常运用的口语虽然还是不同的方言, 但因为有了标准语, 随着教育的普及, 各种宣传工具的广泛使用, 不同方言区人们的交往日益密切等原因, 这些方言的使用范围必将越来越小。

尽管如此, 由于语言发展的渐变性, 除标准语之外的各方言的变化或消失也必然是

十分缓慢的, 标准语与方言将有一个相当长的并存过程。同时, 标准语在其发展过程中还要从其他方言汲取有用的成分来丰富自己。另一方面, 方言的差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地区, 不同时期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 例如有些方言保留着较多的古代语言成份, 或其他方言中缺乏外来的成份。这类外来成份表明该地区人民与外域或外族文化上的某种联系。因此, 对于语言学家来说, 研究各地方言, 不仅有利于促进标准语的丰富发展, 有利于我们了解古代文献, 古代语言发展史, 而且也有利于对民族文化史的进一步深刻理解。

其次, 研究各地方言, 找出其与标准语的差异及对应关系或规律, 有利于帮助操各地方言土语的人们更好地学习和使用标准语, 从而提高语文教育的效率, 更迅速地推广标准语。

再其次, 调查研究各地方言的过程中, 必然要搜集记录各种话语资料, 这些资料一般都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反映, 特别是诗歌, 歌谣, 格言, 寓言, 谚语, 谜语, 成语, 绕口令, 故事, 神话, 童话, 传说等古老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更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因为它们不仅是语言的精华, 研究语言的宝贵资料。而且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民族历史重大事件、生产及社会斗争经验、哲学思想、宗

教信仰、风俗习惯,各种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宝贵资料。它们对于根据其他方面的资料所得出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成果,无疑可以起到补充说明或相互印证的作用。因此,通过方言研究,搜集此类资料,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是有益的。

此外,对于那些需要创造或改革文字的民族,为确定标准语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为新的文字方案提供科学依据,均需首先进行方言调查研究。

方言地理学有几项主要工作,一是记录某些方言的特殊成分或结构;二是对个别方言作出局部或全面的描写;三是调查一种语言在整个或局部地区的一些差异;四是划分方言区;五是说明语言内部差异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方言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指上述第三项工作的方法。通常包括几个步骤:确定调查地区和调查点;确定调查方式;确定调查项目并编制调查表;确定调查对象,进行调查,按调查项目和调查点排列调查结果,然后将结果列表或绘制成方言地图集出版。^③

维吾尔语与汉语、苗语等相比,虽然方言差别不大,但毕竟存在着一些差异。维吾尔标准语的历史是悠久的,但就本世纪初形成的现代维吾尔语而言,近百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标准语已相当普及,其他方言的使用范围已缩小不少,特别是只在占维族人中约1%的罗布地区通行的罗布方言,近数十年来已迅速萎缩。从维吾尔学研究的角度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一步开展维语方言调查研究,一方面可以了解语言内部差异,并结合历史、文化及社会情况,说明某些差异产生的原因,从而很有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强语文教学,有利于促进标准语的规范化和不断丰富发展,从而也有社会价值和实际意义。而且,由于某些方言土语正在迅速萎缩,这已成为维吾尔语研究者面临的十分迫切的任务。

二、百多年来国内外的维语方言研究

近一百多年来,语言学的发展相当迅速,

就维吾尔语的研究来说,从19世纪末发现和解读蒙古高原等地的突厥文碑铭以后,逐渐掀起了各国语言学家研究古代突厥、回鹘语文的高潮;同时,对当代的突厥语,包括维吾尔语,也开始了以新的语言学理论为指导的调查研究。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即外国学者在不同时期对古今维吾尔语,包括汉文所指的回鹘语、察合台语、维吾尔语或现代维语,甚至清代某些文献所指的“回语”,使用了多种互不相同的名称。这些名称再被译为汉文,更是五花八门,互不一致。例如,有些俄文论著以 *уйгурский* 用于回鹘文、回鹘语,以 *новый уйгурский* 或 *таранчинский* 指维吾尔语,或以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уйгурский* 更精确地指现代维吾尔语;许多英文论著以 *eastern Turki* 指维吾尔语,这个术语甚至也包括晚期的察合台语,同时也有以 *ancient Uyghur* 指回鹘语,以 *new Uyghur* 指维吾尔语,或以 *modern Uyghur* 指现代维吾尔语的。那么,他们的这些术语译为“古维吾尔语、老维吾尔语、新维吾尔语、东突厥语、东土耳其语”等等,在当时的条件下,本是不足为奇的,也并非译者的错误。应该明了,翻译他人论著与自己编撰的论著不是一回事,译者,尤其是并不了解突厥语的译者,只能按原文的词语翻译。据此情况,从事维吾尔学研究的学者应该一方面区分翻译与编撰,区分过去与现在,一方面根据国内外各种论著的实际内容去理解和应用它们。

下面,分别介绍各时期国内外有关维语方言研究的重要论著及某些研究情况:

1. 19世纪末期至新中国建立(1949年以前)

这一时期国外学者的论著较多,而国内的极少。国外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

邵(R. B. Shaw)的《东突厥口语概要》I—II(1878—1880)^④,《东突厥语语法》(1877)和《东突厥语词典》(1878)。邵氏的这些论著,是以喀什与莎车的方言材料为基础的,实际上是维吾尔语喀什一带土语的开

创性的研究成果,拉德洛夫(B. B. Радлов, W. W. Radloff)于19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出版了一整套《突厥族民间文学集译》,其中的第6册称“塔兰沁方言”(1886),此时所谓“方言”(наречие)

实指突厥诸族的语言,此册实为维吾尔语伊犁土语的民间文学资料。他在这个时期的另一重要著作《突厥语方言词典试编》(1893—1911)共4卷8册^⑤,其中也有察合台语和塔兰沁方言的词汇资料。潘图索夫(H. H. Пантусов)也发表了《伊犁地区塔兰沁方言研究资料》I—VIII(1897—1907)^⑥。

本世纪初,瑞典学者拉凯特(G. Raruette)曾经在喀什一带对维吾尔语进行调查,发表了《现今叶尔羌—喀什噶尔地区东突厥方言概述》(1905)和《东突厥语语法》(1912—1914)^⑦,论述喀什、叶尔羌(即莎车)一带维语方言语音、语法并附有词汇。德国学者勒柯克(Le Coq)也曾发表《吐鲁番谚语和歌曲附词汇》(1911),《东突厥的诗歌和小说》(1918—1919)和《多朗词表》(1916),此为巴楚地区维语方言的词汇。此外还有库诺斯(I. Kunos)的《叶尔羌方言资料》(1905);施热弗尔(K. Schrier)的《喀什噶尔和叶尔羌语概述》(1913)等论著发表。

拉德洛夫的学生、俄国和原苏联著名的突厥学家马洛夫(C. E. Малов)曾于1909年—1915年间两次来我国新疆、甘肃等地从事突厥语调查研究,他先后发表了《中国西部现代突厥方言研究》(1927)^⑧,《东突厥斯坦居民的特征》(1928),此文着重叙述维语方言,以及《新疆维吾尔方言资料》(1934)^⑨。

原苏联还有巴斯卡柯夫(H. A. Баскаков)和纳西洛夫(B. M. Насилов)合编的《维俄词典》(1939)^⑩,其中包括一些方言词。

拉凯特的学生、瑞典著名的突厥学家雅林(G. Jarring),青年时代就学习和研究维语,并搜集了许多书面资料。从30年代起,他就发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东突厥语语音研究》(1933)^⑪,此书论述南疆维语方言特点甚详,并附详尽参考书目:《东突厥语言资料》I—IV(1946—1951)^⑫,此书

内容为和田、莎车、喀什、库车、塔什米立克(今疏附县境内)及皮山等地关于民族历史、民俗的资料及诗歌、谚语、故事等语言文学资料。

此外,曾在德、美、奥地利等国从事突厥语教学研究的孟格斯(K. Menges)发表的《东突厥斯坦民俗学文献》I—II(1933, 1943)^⑬,也包含许多民间口头文学资料。

综上所述,从19世纪末期至新中国建立前,国外学者在维语方言研究领域中已取得不少重要成果,大致说来,英国、瑞典等西欧学者在南疆维语方言研究上成果较多,而俄国以及原苏联学者多在北疆活动,主要对伊犁地区的维语方言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且也发表了许多很有份量的论著。

在此期间,由于我国处于清朝末年和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经济文化落后,内外战争频繁,并实行反动的民族政策,歧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所以维吾尔语文的研究十分落后。维吾尔族学者依不拉音·穆提义(曾用汉文名穆铁意),在1948年曾发表过《维吾尔语语音学》、《维吾尔语词法》、《维吾尔语句法》及《维吾尔语修辞规则》等进行维吾尔语标准语教学的教材;内地也有徐锡华编著的《注音新疆回文常用字表》(1938),陈郁文、杨永翻译的巴斯卡柯夫等编《维俄词典》所附《维文文法概要》(1948)等等。但这些都是以维吾尔标准语为基础的,并非方言研究成果。此外,在一些汉文的社会科学刊物上,有部分涉及维语方言的论文,如阎童的《国语内地方言与维吾尔方言》(1943),周维新的《维吾尔方言的敬语》(1947)^⑭。

显然,如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比,这个时期我国在维语方言研究方面是相形见绌的。

2. 新中国建立以后(1949年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世界处于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欧美各国经济文化逐渐恢复和发展,从而有可能在过去的基础上开展古今突厥语文的教学和研究,包括对现代维吾尔

语的研究。从1949年至今,国外除关于维吾尔标准语研究成果中包含方言情况外,直接论述维语方言的、含有大量方言资料的重要论著有:

马洛夫编的《维吾尔语哈密方言》(1954年)^⑮、《罗布语》(1956)^⑯,实为维吾尔语罗布方言;《新疆的维吾尔语方言》(1961年)^⑰,此书是在著者逝世后才问世的,内容以和田、喀什、阿克苏、库车、吐鲁番等地方言土语资料及词汇为主。马洛夫的学生、曾经作为专家来我国讲学并参加突厥语调查的捷尼舍夫(Э.Р.Тенишев)在维语方言研究方面的成果较多,主要有《论新疆维吾尔语诸方言》(1963)^⑱、《维吾尔语话语材料》(1984)^⑲和《维吾尔语方言词典》(1990)^⑳。

原苏联境内有一些维吾尔族居民,关于他们的语言有阿加宁娜(Л.А.Аганина)的《苏联哈萨克斯坦奇利克区的维吾尔语》(1954)。

纳吉甫(Э.Н.Наджип)编著的《维俄词典》(1968)^㉑,是迄今规模最大的维俄词典,收了33000词条,其中包括许多方言词。

除原苏联之外,在欧美各国中有孟格斯编的《东土耳其斯坦民俗学文献II的词汇》(1954)^㉒、雅林的《东突厥语—英语方言词典》(1964)^㉓,等等,均有一些方言词。

在我国国内,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执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并帮助各兄弟民族努力发展经济和文化。少数民族语文受到重视,并得到广泛的应用,同时,少数民族语文的教学和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了。

1953年,著名的维吾尔族政治家和学者鲍尔汉,出版了《维汉俄词典》。这是他在40年代依据巴斯卡柯夫、纳西洛夫合编的《维俄词典》,增加汉文及一些必要的词条而成的三种语言对照的词典,其中包括一些方言词。

50年代中期,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及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下,由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以及新疆有关单位的语文教学研究人员和学生,进行了两次维吾尔语方言调查,同时也

开展了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等兄弟民族语言的调查。

第一次,于1955年组织了新疆民族语言调查队,对伊犁、喀什、吐鲁番三个地区17个地点的维语进行了重点调查。最后在中央民族学院李森教授主持下,写出了《新疆民族语言调查汇报》,其维语部分论述了各地语音、语法、词汇的异同。并且就维语方言划分问题提出了划分为三个方言的见解,因为伊犁、喀什、吐鲁番等地区之间以及它们与标准语之间差别不大,合称为北部方言;和田、罗布差别较大,各自成为一个方言。但是,这一汇报只在1955年年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上宣读,未正式出版。

第二次,于1956—1957年组织了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六工作队,对全国各地的突厥语及新疆特有的塔吉克语进行了全面调查,包括对全新疆各地区53个地点的维语方言土语进行了调查,按照统一的调查大纲及词汇表,搜集了关于语音、语法、词汇资料和大量的民间口头文学材料。

这次调查,第六工作队将近一百人,历时一年多,国家耗资十多万元,但由于整风反右运动及此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影响,最后始终也没有集体的、全面论述维语方言的论著出版。所搜集到的关于维语方言的宝贵材料也没有妥善保管和利用,当时一份原始材料由现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保管;另一份重抄材料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后改为自治区文字改革委员会)保管。在北京的一份因保管不力,现已不够完整,一些重要地点的材料已散失;在新疆的一份,至少有一部分已于文化革命期间被当时的“革命委员会”送往造纸厂,早已化为纸浆。

这些材料,具体地说,包括53个调查点的约4000左右单词的词汇本,450多张语音语法问题的调查卡片和各十几二十本长篇材料。这些材料尽管可能有些缺点,例如,没有国际音标,不能据以仔细研究语音问题,

等等,但毕竟是研究维语方言,包含一般语音、语法和词汇问题的宝贵材料,也是研究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宝贵材料。这些材料的丧失是令人痛心的,但我们已无法追究谁的个人责任,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向学术界呼吁,端正对这些材料的认识,尽可能保管好现存的材料,追回散失在某些个人手中的部分,以便今后发挥它们的使用。

这批材料,除个别当时的调查队员在其有关著作中参考利用外,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原苏联的纳吉甫。第二次调查之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与原苏联科学院达成了合作编纂《维俄词典》的协议,由于我方某些机构及人士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又于60年代初自己退出了合作。但在此之前,我方已将维语方言调查材料提供给原苏联科学院的纳吉甫,并派员协助他从中摘录方言词及有关例句等资料。所以,大量的维语方言资料就收入了他在1968年出版的《维俄词典》中。这是一段令人十分遗憾的往事,也是我们中国维吾尔语研究者在学术上的重大损失。我们应很好地从中汲取教训。

60年代,新疆民族语文工作逐渐以维、哈文字改革为中心,学者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与新文字方案、正字法、正字词典等有关的学术问题,发表了一些讨论标准语、基础方言、个别音位、字母及正字法等方面的论著。但也有少数论文是直接论述具体方言土语的,例如:

米尔苏里唐、魏萃一的《维吾尔语罗布泊方言》(1962)和《维吾尔语西南方言和田土语》(1963);朱志宁的《维吾尔语概况》(1964)中也有方言情况。

这几位学者对维语方言划分问题也提出了他们当时的见解。米、魏当时认为和田话与喀什、阿克苏话有许多共同点,都应划归西南方言,则维语可划分为北部、西南、罗布三个方言。朱氏认为,和田话与喀什、伊犁、吐鲁番、哈密等地的话均可归为一个更大的方言,即伊喀(指从伊犁到喀什)方言,与罗布方言并列,总共只有两个方言。

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特殊的政治、社会情况,使学术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不得不陷入低谷,整个70年代,可以说几乎没有关于维语方言的论著发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新时期,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才得以健康发展。少数民族语文研究也从此进入了空前繁荣进步的阶段。80年代以来,关于民族研究的学术活动倍增,专业人才辈出,各种专著和学术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其中也有关于维语方言的论著陆续问世。主要的书籍有:

吾拉木的《简明维吾尔语方言词典》(1986),

米尔苏里唐的《现代维吾尔语方言》(1989),

高士杰的《维吾尔语方言与方言调查》(1994),

米海力的《维吾尔语喀什话研究》(1997),

哈密土语调查组的《现代维吾尔语哈密土语》(1997),

米尔苏里唐的《现代维吾尔语罗布泊方言》(1999)。

这些著作各有特色,吾拉木的词典是关于各方言土语专用词的资料;高士杰的书是高校适用的关于维语方言的教材,既有方言学的一般理论和方言调查方法,又有关于维语三个方言特点的描述和相当充足的具体例句等论据;米海力的书是关于维语某种地方话的较全面的研究成果,其特点是词汇材料较多,并附有长篇材料;米尔苏里唐是我国维吾尔语方言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其研究成果最多,水平最高。他1989年的专著是在数十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综观维语方言的全面情况后,正确提出了划分方言的简明的标准,据此将维语划分为三个方言,并根据各方言内部情况又划分为若干土语,其材料具有典型意义,故在方言划分上有较强的说服力。哈密土语调查组的那本书也是他执笔的,关于罗布泊方言更是他最新的维吾尔语方言研究成果,其资料丰富,分析精辟。因此,他的这些著作是对维语方言研究的重要贡献。

高、米尔二位的著作还使我们看到，他们都主张维语应划分为中心、和田、罗布三个方言，这一观点代表了我国大多数同行学者的见解。

除此之外。80年代，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先后发表了许多关于维语方言土语调查研究的专题论文，例如：

关于基础方言、标准音的有：

阿米娜·阿帕鲁娃的《论现代维吾尔语方言及民族文学语言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1980)；魏萃一的《试论现代维吾尔语方言划分的语音特点及文学语言标准音问题》(1980)。

关于方言划分的有：

高士杰的《试论维吾尔语方言划分的标准》(1986)；李经伟的《试论现代维吾尔语方言的类型及其对划分方言的意义》(1986)。

关于中心方言及其各地土语的有：

李森的《维吾尔语中心方言的主要特点——兼论现代维吾尔文学语言的基础方言》(1986)；阿尔斯兰·阿不都拉的《现代维语哈密话初探》(1986)；张洋的《维吾尔语小堡话调查报告》(1987)；木哈白提、哈力克的《维吾尔语木头沟话的语音特点》(1984)；程试的《维吾尔语喀什市方言语音特点》(1984)；喻捷的《维语喀什话的语音特点》(1986)；热外都拉·艾木都拉的《吐鲁番方言》(1987)；牛汝极的《维吾尔语麦盖提方言述略》(1988)。

关于和田方言的有：

伊敏·吐尔逊的《喀喇汗朝语言及和田方言》(1983)；高士杰的《维吾尔语和田方言的主要特点》(1984)；陈宗振的《维语且末话的方言词》(1985)；靳尚怡的《现代维吾尔语和田话的方言特点》(1987)；阿·沙迪尔的《论皮山土语》(1987)，等等。

关于罗布方言的有：

米尔苏里唐的《现代维吾尔语罗布方言简介》(1982)；米海力的《维吾尔语罗布话名词复数形式分析》(1984)；高士杰的《从语音看罗布方言的基本特点》(1986)，等等。

上述论文是长期从事维吾尔语及其方言调查研究的专家们或80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

学者们根据调查所获材料，对各方言土语的语音、语法、词汇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有的论文作者所论述的正是自己的家乡话，即自己最熟悉的方言土语，所以这些论文大都例证充足，结论可信，很有参考价值。

90年代，依然有一些关于维语方言土语的论文发表，例如：

米海力的《维吾尔语罗布话名词的领格和宾格》(1991)；

阿不力克木的《维吾尔语吐峪沟话的词汇特点》(1996)；

米娜瓦尔的《维吾尔语方言研究中的问题及所面临的任务》(1996)；

努斯热提·尔西丁的《关于吐鲁番方言及其土语的分类问题》(1997)；

彭燕的《维吾尔熟语中的方言词汇初探》(1997)；相立波的《柯坪维语研究》(1998)，等等。

前述热外都拉·艾木都拉的《吐鲁番方言》及90年代努斯热提·尔西丁的论文都提出了“吐鲁番方言”，后者还将它划分为三个土语。这说明关于维吾尔语方言和土语的划分问题，在各位学者中还有些不同的见解，需要继续研究。

总之，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开展了大规模的维语方言调查研究，但主要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直至70年代末期也没有发表多少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同样由于政治形势的转变，促使我国维吾尔语方言研究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新时期。我们相信，在党的方针路线的指引下，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包括维语方言研究，定将继续深入地开展，并获得更重大的成果。

三、在维语方言研究方面值得注意的问题

数十年来，虽然我们在维语方言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研究的范围和研究成果的深度仍有不足之处。为了继续深入地研究维吾尔语方言土语，提高我国维语方言学的研究水平，我们应该冷静地看到目前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

问题。现提出以下一些看法供同行们参考:

1. 我国还缺乏标志着维语方言学已达到较高水平的各类论著

建国迄今 40 多年, 虽然有上述专著和许多论文发表, 其中也不乏优秀的论著, 但始终没能出版既有理论阐述又有实际材料的全面论述维吾尔语方言土语的大型专著。这样的专著中, 应该有关于方言、土语的全面描述, 包括其特点及其划分方言土语的依据, 某些特点形成的原因和过程等理论阐述, 又有可以互相对照、比较的词汇、典型常用句以及能表明各方言土语特点的长篇材料。我们更缺乏成系统的各方言土语的录音资料。

我们还缺乏材料丰富、全面, 便于对照, 便于检索的维语方言词典。这样的词典, 不是仅仅包括几千常用词, 而是应有上万词条, 除常用词之外还包括各方言土语代表地点的方言词、特有词和某些行业的术语等丰富的词汇资料, 并能从标准语的词查到方言土语中与其相对应的方言词; 从方言词或特有词查到其在标准语中的对应词或用标准语解释的词义。

方言地图, 或称语言地图, 是根据语言及其方言的语音、语法、词汇特点的地理分布, 以地图为基础, 用图案、色彩、线条、数字或其他手段表示各地方言土语异同或相互关系的地图, 亦即以多幅地图说明方言特点的形象化的方言学著作。我国各民族语言研究虽然还多未具备编辑出版方言地图的水平, 但从长远的需要看, 我们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

2. 方言材料的搜集、保管、刊布、利用还有待于加强

材料是科学研究的生命, 方言材料就是方言学的生命。因为有了准确、充足、全面、系统的方言土语材料, 才能取得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这是对方言土语调查材料的总的要求, 但实际上由于各种原因, 调查所得材料往往会有某种欠缺, 然而, 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随便地否定或轻视方言材料的价值, 必须特别注重方言材料的搜集、保管、

刊布和利用。

一项领域较广的学术材料是要经过较长期积累的, 需要两三代、甚至好几代学者连续不断地积累。如果我们要实现编著、出版上述维语方言学论著的目标, 就必须大大加强材料方面的工作。50 年代的材料尽管已不够完整, 仍然是有价值的材料, 应认真地保管好, 并力争先将现有材料整理后刊布; 未经调查的地点应有计划地调查, 更全面地搜集方言材料; 各位学者保存的方言材料可能是已发表论著的依据, 也可能记录者尚未利用, 也都应该予以整理、刊布, 以便长期保存, 供搜集、记录者本人和其也同行们参考和利用。各个学术机构和学者都应尊重和保护方言调查记录者的著作权, 学术界、出版界在语言研究成果的评价、审查、出版方面, 应该克服重标准轻方言, 重结论轻材料的不良倾向。

3. 维语方言研究的深入开展急需有关机构的组织和领导

80 年代以来的维语方言研究显然处于各地学者们分散的、自发的、随机选点的研究状态, 继续如此, 仅靠学者们个人单干, 很难深入开展维语方言研究, 并获得全面、系统的重要研究成果。如果我们要将维语方言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必须由有关机构来组织领导。动员有关单位的学者, 提出适当的规划, 投入必要的经费, 加强对这项研究工作的领导。

四、结束语

在突厥语文研究领域内, 世界各国学者大都根据本国或本人的主客观条件, 选择各方面最有利的课题去努力钻研, 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从而在这一领域内取得学术上应有的地位。具体地说, 在全世界操突厥语的现代民族中, 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撒拉族和裕固族是仅分布于我国青海、甘肃的民族。那么, 我们中国突厥语文研究者就应该在这三种语言研究上投入更多的力量。目前, 我们在古今维吾尔语文方面有较好的条件, 今后仍需努力。尤

其是在外国学者们困难较多的维语方言研究方面狠下功夫,培养出一批维语方言研究的权威,并力争在下世纪初取得史无前例的成系统的重大研究成果。从而提高我国在突厥学界的地位。

注释:

①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北京、上海,1988年,《方言学》、《方言地理学》等词条。

②吕叔湘:《语言和语言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首第3页。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方言地理学》。

④为便于读者参考,本文尽可能以列出外国学者重要著作的原文题目、出版地及出版年份:R. B. Shaw, A sketch of the Turki Language as Spoken in Eastern Turkistan (Kashghar and Yarkand), Calcuta, I — II, 1878—1880。

⑤B. B. Радлов, Опыт словаря тюркских наречий, СПб, 1893—1911, тт. I — IV。

⑥H. H. Пантусов, Материалы к изучению наречия таранчей илийского округа, вып. I — IV, 1879—1901。

⑦G. Raquette, Eastern Turki Grammar.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with vocabulary. Berlin. 1912—1914。

⑧С. Е. Малов, Изучение живых турецких наречий западного Китая, “Восточные записки”, Ленинград, 1927。

⑨С. Е. Малов,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уйгурским наречиям

Синдзяна, Ленинград, 1934。

⑩Н. А. Баскаков и В. М. Насилов, Уйгур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1939。

⑪G. Jarring, Studien zu einer Ostturkischen Lautlehre, Lund, 1933。

⑫G. Jarring, Materials to the Knowledge of Eastern Turki, I — V Berlin, 1933—1934。

⑬K. Menges, Volkskundliche Texte aus Ost-Turkistan, I — II, Berlin, 1933—1934。

⑭笔者未见到这两篇论文,具体内容是否目前我们理解的“维语方言”是可疑的。

⑮С. Е. Малов, Уйгурский язык, Хамйское наречие, М. Л, 1954。

⑯С. Е. Малов, Лобнорский язык, Фрунзе, 1956。

⑰С. Е. Малов, Уйгурские наречия Синдзяна, М, 1961。

⑱Э. Р. Темишев, О диалектах уйгур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индзяна, М. л, 1963。

⑲Э. Р. Темишев, уйгурские тексты, «наука», 1984。

⑳Э. Р. Темишев, Уйгурский диалектный словарь, М, 1990。

㉑Э. Н. Налжип, Уйгур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1968。

㉒K. H. Menges, Glossar zuden volkskundlichen Texten aus Ost-Turkistan, ㉓, Wiesbaden, 1954。

㉔G. Jarring, An Eastern Turki-English Dialect Dictionary, Lund, 1964。

㉕关于上述论文的评介,请参阅王远新的《中国民族语言学史》,北京,1993年,219—225页。

The Researches on Dialects of Modern Uygur Language: Review and Prospects

CHEN Zong-zhen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contents of this article: 1) The importance of dialectology; 2)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achievements in researches on Uygur dialectology since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3) Some problems of Uygur dialectology which merits our attention.

Key words: Uygur; Uygur language; dialects; dialectology